

## ■ 齐鲁策论

## 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促共赢

□ 宋远方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产生的高级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使人类社会创造出空前巨大的物质财富，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在深刻反思传统工业化教训之后产生的生态文明，其要义是以尊重自然和维护自然为前提，着眼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互促共赢，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以来，全国各地都进行了探索和实践。聊城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积极作为、科学务实的指示精神，在山东省率先创建生态文明市，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推进的明显成效。

## 发展与环保相互促进成就突出

在传统工业文明的理念之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天然的矛盾，发展路径必然是“先经济后环境”、“先污染后治理”。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首都伦敦号称“雾都”，高浓度的二氧化硫和烟雾颗粒在城市弥漫百年之久，1952年“伦敦大雾”事件造成几天内死亡人数达到了4000多人。经过20世纪中叶以来几十年的治理，才有了伦敦今天的清新模样。匹兹堡上世纪初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基地，当时整个城市烟囱林立，黑雾笼罩，至今保留下的一些熏黑的建筑，成为那个生存环境恶化年代的见证。从50年代起，经过半个世纪的环境改造和产业调整，匹兹堡的生态环境得到大大改善，一跃成为全美最适宜居住城市，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带来了极其沉痛的教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至今仍在困惑着一些秉持传统工业文明理念的地区，认为二者不可兼得，强调环境保护会影响经济发展，强调经济发展就顾不上环境保护，致使有的地方环境保护较好但经济没有搞上去，有的地方经济发展较快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而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之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2007年，新一届市委、市政府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识到，聊城地处平原，人口稠密且分布均匀，生态自我修复能力很差。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时代背景下，

面对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如果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发展的代价太大，而且一旦发生生态灾难，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必须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促共赢的路子。通过狠抓生态文明市建设，近年来，聊城市在持续保持农业全省领先地位和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工业实现了跨越发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由2006年的1407.42亿元发展到2011年的5294.08亿元，翻了近两番，总量在全省的位次由第13位上升到第7位。在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持续改善。节能和减排两项指标在2006年全省综合排名双双第16位(倒数第2位)的基础上逐年攀升，到2010年上升至全省前4位和第6位。由于同时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突出成就，2011年，聊城获得了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称号，成为环保部成立后按新标准验收通过的全国第一个地级市。

近年来，聊城秉承生态文明理念，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步伐，发展起信发铝业、祥光铜业、时风机械、奥博特铜铝业、泉林纸业等一批以循环经济为特色的大型骨干企业。其中，信发铝业、祥光铜业是国家级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试点企业；泉林纸业是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企业，祥光生态工业园成为我国设在县域的第一家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 加减乘除互促共赢

树立生态理念，统一思想认识。建设生态文明市，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在新理念指导下的新实践。为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形成建设生态文明市的自觉行动，2008年10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建设生态文明市动员大会，市、县、乡三级领导干部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共1000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以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上级领导之重视，在全市上下产生强烈反响。随后，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出了“生态是借贷而不是继承”、“GDP增长不等于财富积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碧水蓝天”、“建设生态文明从我做起”等通俗易懂的理念和口号；采取报告会、党校培训、学习参观、新闻宣传、文艺演出等形式，深入宣传生态文明市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现途径；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县(市区)、生态文明乡镇、生态文明社区、生态文

明单位、生态文明企业等创建活动，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使践行生态文明蔚然成风。

发展生态经济，加快转调步伐。工作中，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加、减、乘、除”四项举措，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促共赢。

——“加”，即加大优质高效投入，以增量优化促进存量调整。市委、市政府坚持每年抓好100个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财税贡献大、节能环保的重点项目，确保新上项目的质量和水平即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形势最严峻的2009年，在全国全省大上项目的热潮中，聊城也没有上污染项目，所上的都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节能环保的大项目、好项目，奠定了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

——“减”，即铁腕推进节能减排，努力降低生态成本。聊城工业以重化工业为主，节能减排的压力十分沉重。在2006年节能减排指标双双列全省倒数第2名的严峻形势下，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背水一战，在省下达目标任务的基础上主动调高指标，与各县(市区)和重点企业签订责任书，抓好各项任务任务的落实。一是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二是突出抓好重点领域三是强化源头控制。2009年代表山东省在国家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考核中获得第一名；2011年成功创建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乘”，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倍增”效应，增创发展新优势。坚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广应用节能环保技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大批传统型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了由大变强的深刻转变，信发、祥光、泉林等重点企业在实践中探索出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新能源汽车、节能设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2011年，聊城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

——“除”，即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服务业，做大“分母”调优结构。一产和三产是发展生态经济的重要领域。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同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服务业，成为“无烟产业”成为聊城经济的新支柱。狠抓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上档次的龙头企业、成规模的特色农产品基地、有影响的生态农产品品牌。

切实加强考核，树立工作导向。目标考

核是各级干部工作方向的“指挥棒”。市委、市政府将建设生态文明市的主要任务进行了量化分解在此基础上，又以生态文明市建设为核心，对目标管理考核体系进行了重新设计，分为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社会、政治建设、党的建设和群众满意度测评等7个方面，创造性地构建起一套设置科学、方便量化、适合操作的考核指标体系。

## 互促共赢给我们的启示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完全可以实现互促共赢。聊城以自己的工作实践充分证明，只要坚持生态文明的理念，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抓工作，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不仅理论上可行，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完全可以做到。

发展循环经济是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的最佳切入点。贯彻落实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有多种渠道，聊城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子，也就是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既实现了节能减排，保护了生态环境，又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使转方式、调结构有了具体抓手，将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环保约束是生态文明理念下的发展动力。从聊城的实践看出，由于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市的目标，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入手，多措并举促进经济环保同步发展，使这一压力得到积极释放，倒逼转方式、调结构，促进科技创新，催生新工艺、新设备、新项目，带来新的效益，从而使压力变成动力，动力推动了发展。

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必须有过硬的措施。一方面，决策者认识要清醒，意志要坚定，促使各级干部步调一致、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地向前推进；另一方面，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接受，使新理念被群众所掌握，转变成巨大的物质创造力和自觉的社会监督力。为此，聊城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大规模会议进行动员，制定了强有力的目标考核措施强力推进；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广泛宣传，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使生态文明建设在聊城大地结出丰硕成果。

(作者系聊城市委书记)



在火车问世的时候成为一匹马，在汽车问世的时候成为一名铁匠，那将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股神巴菲特 卢鹏画

## “炮轰”与揭盖子

□ 卢伟



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很多学科，离大众的日常生活有不小的距离，不少学者在象牙塔里一待就是几十年，默默地做着学问，即便是颇有成就，也鲜有媒体和公众关注，少有把学问做到了圈外的知名学者。

经济学则不然，是当今社会的“显学”，借着市场经济的东风，最近这一二十年的经济学火得很，虽说在全世界叫得响的研究成果寥寥，但并不妨碍一众经济学家们肥马轻裘，出入官方、企业、民间，成为侃侃而谈的座上宾。几个比较知名的，时不时登上媒体封面，成为百姓话题，风头甚至盖过娱乐明星。

最近比较火的是一个邹恒甫。虽然贵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学术水平在权威的Ideas RePEc最新一次排名中高居华人第一，但跟国内那些靠着为官方出谋划策或为大众传道解惑出名的同行们不同，邹恒甫在普罗大众中的名气主要是靠口无遮拦的“炮轰”得来。

最近一次的“开火”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说很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学问做得很烂，按国际水准衡量根本就不入流。“张维迎在权威经济学家排行榜上要排到25000名以外，是吴敬琏、茅于軾、樊纲等人甚至都上不了榜。”二是说很多人不学无术，忙着凑钱，而且人格分裂，给垄断企业当独立董事，“一边炮轰权贵，一边当权贵”，“一边批判垄断企业，一边给垄断企业当独立董事，拿高薪。”这两炮轰出去后，国内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几乎无人漏网。

抛开里面可能夹杂的江湖恩怨和情绪宣泄不说，邹的“炮轰”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狂妄里面反映了若干真问题，说是揭开了国内经济学的几个盖子也未尝不可。比如当独立董事这事儿，独董制度的本意是想让那些不在公司任职的外部专业人士进入董事会，对内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对外向投资者传递客观中立的信息，但国内的这些大牌经济学家当上独董之后，基本上都成了沉默的花瓶，安享几十万的年薪，网声发大财，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大概是自觉理亏，在遭受炮轰以后不少身兼多职的独董纷纷选择辞职，仍然在位的也选择沉默以对。

再说说经济学家们的学问。以世界眼光来看，学术这个行业其实有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不论年龄、性别和国籍，只要你学问做得够好，在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可以当教授，拿高薪，香港的高校正教授年薪都在百万港币以上，美国的教授们买得起前后带花园的别墅。像经济学这种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学科更是如此，衡量学术水平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比如，在最顶级的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引用率如何等等。几年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声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丁是搞社会学的，他敢于这么说，就在于他对这个国际标准很熟悉，并坚持以此来衡量国内经济学家的斤两。虽然丁一再放活话来，国内有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可以把自己最得意的几篇文章投给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或者申请他们学校的副教授试试，如果被录用他一定认错，好像也没见哪位经济学家接招。

其实，国内的学术水平离发达国家有相当距离，这是事实。经济学相对算是差距较小的学科了，而且不论近年来长足的进步，拿到北美好点的学校经济学博士回国任教，年薪起点都在三十万元了，就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完全以单一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价值，不科学也不现实。像吴敬琏、茅于軾等人的学术成就拿到世界上还算不上一流，这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会否认，但他们对社会转型进程的深入参与与推动，对经济学理念与常识的普及，对改革方向的坚持与宣扬，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辆急速前行的汽车，运行精深的汽车原理，探究汽车内部各个零件究竟如何运行固然很重要，但教人好好开车，告诉车上乘客怎么开能顺利到达目的，怎么开搞不好会翻到沟里，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尤其是当这辆车该怎么开争议很大，车上乘客意见不统一，目的地也有争议的时候，多个挺身而出出的智者告诉大家如何才能避开前方的陷阱，每个弯道的力度与方向，于国于民都喜莫大焉。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 发挥高校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刘兴云

高校的功能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拓展和丰富起来的。从大学刚出现时培养人才的一维功能，到增加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三维功能，再到当下增加的文化引领功能，这既是社会发展对高校提出的要求，也是高校在不断适应社会需要对自身功能的调整 and 充实。高校功能的发挥决定了它在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 高校与城市的“共生”关系

高等教育、高等学校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两者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回顾国际经验，英国诺丁汉大学以“城市建于智慧”为办学理念，其在内涵就是“大学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践行这一理念的典范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由于它的研发源泉和人才源泉，在其周围形成了“硅谷”；还有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源泉和依托，产生了芝加哥—波士顿28路线高新产业区。在我国，北京中关村信息产业基地的形成与发展，与海淀区大学群有着直接的共生性。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当下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依懒度已越来越大，两者必然地成为一个有机的共生系统，重视发挥高校的功能及其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首先，高校重视社会服务是“政治论”认识哲学的需要。在不同认识哲学的支配下，高校的三大职能分别拥有不同的地位及内涵。自从以《莫塞耳土地赠予法》为标志的社会服务职能确立以来，我们一直处于“政治论”哲学居主导的时代。这就决定了高校距离社会越来越远，而这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表现的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社会服务一定是高等学校日趋重要的职能形式。

其次，社会服务是高校办学特色的有效路径和需要。“大学特色的目标是服务社会发展为宗旨，创造领先的科研成果，培养出有独特个性和丰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大学的办学特色是在服务社会中实现的，服务社会是高校特色寻求的有效路径特色恰恰是一所大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其建设一流大学的必要要素。

再次，社会服务是高校生存与发展的保障。高校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始终与它生存的周围社会发生作用，高校就是在与周围组织的相互作用中生存和发展的。克拉克·克尔计算过，1520年前建立的85个组织，至今还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同样的名字、做着同样的事情，其中有70个组织是大学。之所以如此，高校对于社会的价值、功用是一个重要原因，它能够解释高校历经时代变迁和制度更迭后依然能够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纵观世界，凡是历史悠久、经济发达的

城市总能看到若干著名高校活跃的影子。如伦敦的剑桥大学，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凡是闻名于世的大学总是对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城市硅谷。

在发展的过程中，高校社会服务本身的内涵也在逐步扩大。从最初直接服务于农业和其它生产劳动到立足于为地方培养人才和输送知识，再到今天的通过教学服务旨在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服务的理念已经开始渗透到高校的其他职能当中。在今天，“高校的社会服务就是在保证教学、科研任务的基础上，发挥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优势，充分利用高校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实验室等良好条件，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的旨在促进企业、行业、地区等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活动。”虽然，今天的社会服务职能的内涵得以扩展，但它仍然受制于前两种职能，也就是说，它一定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之下的社会服务。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是对其他两项职能的延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并受制于其他两项职能。

## 高校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路径

高校的显性服务路径主要体现于为城市经济社会提供教学服务和科研服务。显性服务功能是高校自觉的功能，是个性功能，它因高校的使命、定位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不同类型高校的经济社会服务体现出路径差异性。我国学者甘晖等人将高等学校划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高职高专院校四种类型。这样，高校类型与其服务社会的路径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四乘二的矩阵。其中，高职高专院校对社会的作用更为直接，其次是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对社会作用方式最为间接的是研究型大学。

高校的隐性服务路径有两个：拉动当地经济。大学生作为一支庞大的消费群体，能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高等教育扩招后变得更为明显；涵养城市文化。高校不止作为文化中心，对其所生存城市社会的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辐射作用；她更作为文化的生成中心，对所生存城市社会的文化具有引领、提升的作用，能够涵养城市文化。

## 面临的问题

高校生存于一定的城市社会环境中，其隐性作用是自在发挥的，无须人为地创造条件。而其显性功能却只能自觉发挥，需要一定的条件对之做出保障。然而，我国高校服务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不足，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使得高校不能得以顺畅地服务

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特色缺失。作为职能教育的基本载体以及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的专业设置存在明显的学科导向性。这体现在高校从招生到培养的各个环节。比如，教学方式缺少实践教学或流于形式。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仅体现了科技成果的“学术价值”，忽略了“市场价值”，这是造成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制度缺失。社会服务职能在我国高校的实践中还缺少相关的制度保障。首先，缺少激励政策。在最直接关系教师切身利益的教师聘任制度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对教师科研能力、科研成果的强调，其次是教学，而几乎看不到对教师社会服务行为和成果的强调和要求。缺少评价制度。已有的评价制度存在严重的“重高深、轻应用”现象。再次，高校社会服务的管理组织不完善，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没有专人负责，没有相应的规划措施。组织制度的缺失造成社会服务在我国很多高校只能停留于号召或口号，而很难得以真正落实。

经费缺失。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速度不成正比，我国高校的教育经费增长缓慢。目前，我国财政经费支出仅为3.19%，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际6%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

## 构建支持社会服务的制度体系

高校服务于城市经济发展应注意的几对关系。

高深与应用的关系。高等学校尤其研究型大学是高深知识的殿堂，它们因高深知识而生。高深知识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依据。从本质上说，高深与应用分别对应于“发现的学术”与“应用的学术”。如何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如何在一所高校中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整个高校学术能否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果过于注重为社会服务，则大学容易沦为“社会服务站”，如果仍旧抱持其高深传统，则大学极易封闭自己而再度成为“象牙之塔”。因此，高深与应用的关系将成为高校发挥其对城市经济社会作用时需要协调的首要关系。

精神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为地方提供产业咨询服务是社会服务职能的经典职能，作为一种显性职能，很容易受到重视而精神培

育和人文熏陶虽然是社会服务的一项隐性职能，但它却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对于一个地区的精神面貌、人文素养起着“人文化成”之功能，高校在服务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候，应特别注意把握好精神与技术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到两者的平衡兼顾。

同时，构建支持社会服务的制度体系。加强人才培养的服务面向，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各类型高校应结合自身条件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学校自身条件，重新确定服务地方经济的独特人才培养模式。尤其应重视学科专业的建设，应尽可能全面地考察本地区的经济形势，使得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科研学术活动都能满足本地区产业、企业的发展现状和需求。

加强社会服务支持制度建设。首先，建立专门的社会服务机构。其内部人员的组成由大学和企业共同提供，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专门的机构支持。其次，加强对高校社会服务职能评价体系的研究。评价是指指挥棒，也是高校一系列制度中最具指导力的一种。评价体系中对社会服务的忽视，容易给各主体造成一种“社会服务可有可无”、“社会服务不重要”的偏见。进而影响他们对社会服务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另外，要想克服目前高校对社会服务的弱势问题，“自重”是唯一有效路径，而“自重”的核心便是评价制度的建立。最后，制定社会服务的激励政策。在事关教师切身利益的职称聘任制度中，加大对教师社会服务行为的考核指标设计，将对教师社会服务行为的考核与其职称聘任等切身利益相挂钩。

加强研究的现实导向。目前，在传统学术观的影响下，我国高校的科研主要集中在纯理论研究，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探究，相对忽视了社会需要。这直接导致高校科技成果的低转化能力。高校应树立大学学术观，扭转“科学研究即为学术”的传统观念，认识到科学也是学术，认识到现实问题才是学术的生命源泉。鼓励教师多开展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加强研究的现实导向。

鼓励高校融资，优化资源配置。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校应多方自筹经费办学。这也是高校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转变。在此前前提下，高校还应做好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正如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所言：“要控制成本，最关键的还是资源配置问题，同样也是提高效率的关键所在。”“控制和降低办学成本的核心在于如何使校内有限的资源运用得更为有效，中国的大学应该尽量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校内资源分配系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达到对资源的高利用率，最终实现为高校的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足够经费保障的目的。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校长)